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深入（笔谈）

小议抗日战争史研究

陈铁健

近数年来,学术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有些重大的必要的拓展。其中,突出之点,是对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研究有所重视,写出一些文章和著作,内容水平不一,质量有别。由此,引起一些议论和疑虑,似觉得这些著作偏多了,评价偏高了,等等。照我看,所谓多与高,是相对比较而言。过去几十年人们都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宣传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战业绩,贬斥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活动,而很少甚至不敢认真研究正面战场的得失。“噤若寒蝉”,大概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那时候不少人的心态。今天,这样的心态少了,写出不少从未见到的新著作,又一下子那么集中地推到人们的面前,于是有人惊愕之余说是“多”了,“高了”。这无疑又是那种寒蝉心态的曲折的再现。我所接触的学者中,十之八九不赞成这样的疑虑。

对于抗日战争,人们须有一个共识,即抗日战争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个派别的抗日战争,而是全及于全体中华民族,地及于整个华夏大地的抗日战争。当年毛泽东说:“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一般的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唯一无二之任务!”蒋介石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两个人的论断都是正确
的，都代表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使是为了深入研究、高度评价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也不能不研究正面战场和正规战。这是学者圈中谁都懂得的道理。至于评价的高低问题，也只有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展开充分的讨论争鸣，才有可能取得合乎历史真实的科学的结论。实事求是，仍旧是抗战史研究的唯一的指导方针。正面战场的研究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应该鼓励有志于此的学者循着实事求是的方针认真做下去。对于他们在研究著述中所产生的失误，应取宽容的态度。这不仅无害于抗战史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入抗战史的研究。否则，就只好转回到几十年的老路上：你说他“不打日本”，他说你“游而不击”；一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不仅自己不承认，外国人也难以承认，结果是自我否定，人亦否定，以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竟没有中国战场应有的地位。

最近，一位青年学者对我说，他读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所有决议案，感到有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是否与“积极反共”同时俱来？五中全会的排共反共迹象明显，但反共的决议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而大量的仍是有关坚持抗战的决议。实际上，1939 年至 1940 年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攻势作战仍未稍减。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大小战斗近 500 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 44%，军队伤亡人数达 137.6 万，占整个战争期间的 43%（参见马振犊：《惨胜》一书）。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都是“积极”的。由此，人们会想：过去认为是科学的流行至今的观点中，究竟有没有不那么科学的？有没有加以重新考察的必要？如果认为有必要，那么学者自身有没有更新观念、去掉禁忌的必要？这个问题，只有请学者自己来回答了。

抗战研究，离不开抗战人物的研究。1938 年 10 月抵达华府出任驻美全权大使的胡适，是研究抗日战争外交史不可忽略的人物，
然而过去人们对他的误解甚多。胡适有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一场批胡运动，把这首诗当做胡氏投靠蒋介石的罪证，误导当代人长达几十年。不可否认，这首诗中不无诗人入仕后某些欣喜心情。诗中主要是胡氏在大使任内为争取美国援华抗战而殚精竭力的心境与行动的写照。陈光甫在当年日记中描述胡氏的困苦处境说：胡氏经常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贺伯克打交道，贺氏老气横秋，派头十足，“彼对（胡）适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然而胡适以一介书生在国家危急之际，抱定“有日力量，出一日力”的决心，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终于敞开美国援华的大门，翻开了中国抗战外交史的新篇。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有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贡献，也有千百著名人物的不朽功勋，两者都要进行研究，不可偏废。这些研究，几十年来究竟多了，还是少了，不妨调查一下，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以利于推动抗战史研究健康的向前发展。

对于抗日战争史，我只能算作是一名读者，所以未必合乎时宜，然为学术发展计，又不能不秉笔直陈，以就教于识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加强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

何 理

繁荣和推进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是史学工作者的共同愿望。1985 年抗战胜利 40 周年前后，是国内抗战史研究的高峰和繁荣期。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及正面战场的作用和评价问题，两
个战场的关系问题，中国抗战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及其贡献问题，等等，突破长期的思想禁锢，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公允的解说。这些研究领域的拓展，奠定了中国抗战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基础。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些问题不解决，一部全面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史是无从产生的。

从抗战胜利40周年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十年磨一剑”。应该说国内抗战史研究取得了许多很可喜的成就。尤其是在地方史、专题史、工具书、人物传记等方面可谓成绩斐然。但冷静思考，似乎这十年的研究工作也有其缺憾。我看，最突出的问题是选题过于分散和过于重复，研究力度不够。总体格局、思路框架以及关于抗日战争史上的重大问题研究上突破性的进展不多，别开生面的有开拓性的论著比较少。这种现象可能是在一次学术高潮之后，出现的为下次学术繁荣作准备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把抗日战争史研究推向深入，这里我想谈一点个人的想法，这就是进一步加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历史以及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研究。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研究抗日战争所引起的中国政治、思想以及社会各方面变化的深刻内容和深远影响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历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首先，抗日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总起来说，这就是民主爱国进步力量的上升和腐朽反动力量的下降。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觉醒，成为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决定力量。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下，投入了民主爱国的革命阵营，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势力进一步孤立。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巨大分化，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派别也进一步明朗化，逐步形成民主爱国的进步力量与反民主的腐朽反动势力两条战线，阵营分野更加明显。抗战后
期兴起的民主运动和民主爱国战线的发展壮大,不仅对抗战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对抗战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已被解放战争中迅速兴起的全国人民反对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民主爱国统一战线所证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中国社会的这些发展进步,中国如此迅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联系,还应着力研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决定影响的国共两党状况及其不同的社会经济政策。目前,史学界对抗战战争中国共两党不同抗战指导方针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对两党的社会经济政策则研究得很不够。国民党战时政治、经济政策,虽然对坚持抗战起过一定作用,但因缺乏深刻的社会革新产品,在根本上保持和维护了旧的落后的封建剥削制度,脱离了广大农民和进步的社会阶层,也使自身日益腐败下去。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实行以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为中心的一系列限制封建剥削,逐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进步政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解放区所进行的人民民主性质的社会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研究国共两党不同的抗路线,并结合研究两党不同的社会经济政策,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趋向和规律,无庸置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在中外关系问题上,抗日战争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废除了列强近一百年来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这也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骤。历史上中国封建统治者,推行过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外国列强交往完全属于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的不平等关系中。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抵御了并战胜了亚洲强国日本,取得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外国侵略的胜利。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长期的艰苦奋战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伟大贡献,同时也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
声誉和地位。同样，世界各国对德、日、意的作战也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改变了历史上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把自己的民族利益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和人类进步事业一致地联系起来。八年抗战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平等独立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人民重新认识自己国家放眼世界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走出固步自封、消极被动的圈子，以一种新的姿态重新登上世界舞台，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虽然在抗战胜利后一度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的破坏，但这种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不能改变的，也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止的。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当然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状况和规律的阐释。但是，我认为，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则应着重研究抗日战争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在以上诸多方面变化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这对我们更好地继承抗日战争的宝贵经验和历史遗产，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将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抗日战争史研究之我见

张宪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由 1949 年至 1966 年，这时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刚刚起步，除有些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国民党抗战态度的文章外，成果还不多，学术水平亦不高。第二阶段由 1966 年至 1984
年，这时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在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大批文章著作研究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伪政权史的研究也有所开展。但是学术研究不够全面，正面战场和国统区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第三阶段由1985年至1994年，在这一阶段中，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走上繁荣。大量的论著探讨了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敌后战场的研究也有进一步发展。根据地政权和财经史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团体也建立起来，研究队伍更加壮大。可以预料，1995年将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树立新的里程碑。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走上更高的阶段，需要进一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重大的理论问题以及一些重要的史实，应该通过研究、讨论，形成符合历史实际的基本看法。抗日战争既然是一次反侵略的民族战争，那么不管是哪个民族、政党、阶级、团体或个人，只要站在保卫国家、民族的反侵略立场上，哪怕是做了点滴贡献，也应该给予肯定。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史学工作者应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应进一步克服偏见和主观主义。

第二，拓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领域。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史的研究，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基本上弄清了两个战场各自大规模战役、战斗的情况，但是从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演变，还十分缺乏。因而对战争缺乏宏观的、整体的认识，也难以正确的总结战争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战争的胜利，需要强有力经济支持。抗战后方的经济战略曾发生重大变化，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必须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形成了三个统治区域，其中对沦陷区的研究除汪伪政权外，均甚薄弱。

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应该拓宽思路。抗日战争是一次战域广阔、规模宏大、持续时间久的反侵略战争，它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扩大研究抗日战争
对远东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应该研究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哪些作用。在日本军事侵略下，中国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对这方面研究甚少。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面将抗战史研究引向深入。

第三，在我国台湾和国外，特别是日本和美国，都保存许多重要的抗战史料，并发表不少论著。我们应该重视吸取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和抗战史料，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也只有广泛掌握了各方面的史料和了解各种观点后，抗战史研究的成果才可能建立在比较坚实可信的基础上。

第四，经过多年的努力，抗战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总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这就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努力开发史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抗战史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我想应该在扩大研究范围和开展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力量以新的思想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撰写一套抗日战争全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和抗战史研究笔谈

丁则勤

今年是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五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五十周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自从 1840 年以来，中国连续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英勇的反侵略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可是由于各种历史原
因，那些正义斗争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五十年以前结束的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才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正如刘少平所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在那以前，每一次革命斗争，爱国运动各有功绩，却没有任何一次足以比得上抗日战争推进历史车轮的显赫功绩。”（《中日学者对谈录》序言）

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九一八事变前不久的一次演说中认为中国“依然处于军阀混战的时代”，尚无统一国家的力量，通过操纵亲日军阀也可以推翻蒋介石政权。（《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篇，第 103—104页）。卢沟桥事变时，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对天皇说，一次派出大量军队，短期内就可以把中国的抗日压下去，“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失われし政治—近卫文麿手记》，第 121页）那时，日本军部、政府、垄断资本家和天皇都坚信只要大兵一出，中国便会立即屈服。战争开始时，日本统治集团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战争会致日本帝国于死命。他们迷恋于过去侵略战争的“胜利”，回味侵占中国东北时的味道，以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定也同过去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灭亡整个中国。他们当然是打错了算盘。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极端野蛮残暴的侵略，把中华民族逼向了绝境。诚然中国过去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落后，人民被讥为“一盘散沙”。那是因为中国人民尚未组织起来的缘故。但是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又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觉悟，全国人民热血沸腾，抗日救亡，形成无比坚强的民族凝聚力，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正确的领导下，形成了坚强的组织和巨大的力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11 页）。全体炎黄子孙奋起抗战，日本侵略者只能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说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我非常赞同有些学者关于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很大进展的看法。

第一，在这十年中，颇有一些有份量的专著问世。例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体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三卷（下卷即将出版）。日本侵华史方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鹍、沈泽主编的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堪称高水平的力作。再如，国际关系方面，徐蓝所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也是一部史料扎实和有见解的好书。陶文钊所著《中日关系史》（1911—1950）一书的有关章节，在观点和材料方面都有建树。

第二，1991年1月，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宣告成立。这是抗日战争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全国抗日战争研究新阶段的开端。学会在同年创办了学术刊物《抗日战争研究》。学会自成立以来，短短数年，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全国性、地区性的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研究》自创办以来，刊载了大量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其中不乏佳作，刊物中还及时发表了不少学术研究动态和信息，成绩是显著的。进一步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既要靠编辑部同志的努力，更要靠全国研究抗日战争史学者的共同支持。

第三，近几年来，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与组织工作中，有一些好的作法和经验值得肯定和发扬。

其一是有计划有重点地拟定研究项目和课题，集中人力、财力和时间，创造一些条件，使一些重大课题和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近几年在这方面已有很大成绩，今后还应继续努力。

其二是，在纪念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时，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成果分别用中文和日文出版了内容、编排相同的论文集。这一作法值得肯定，日本井上清教授称之为“盛举”，是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
略谈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现状与深入

张注洪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好几位研究有素的学者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了深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见解。我这里只是做点补充。

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首先表现在近年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 如军科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两套《抗日战争史丛书》(陆续问世)和若干有见地的论文, 从总体上或从不同方面进一步深入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与此同时, 还整理编印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和回忆录, 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星火燎原》有关抗战部分以及有关国民党正面战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百团大战等档案资料集, 便于研究利用。令人欣喜的是一系列学术讨论会, 如
纪念“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以及台儿庄战役和中日关系史
等会议的顺利召开，抗日战争研究学术空气活跃，国内外学术交流
显著增强。特别是与学术界有广泛联系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
建立和学术刊物《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办，使研究工作得以有计划
地进行，并提供园地经常交流研究信息和成果。此外，有关单位还
举办了史料陈列，电视广播以及其它文艺宣传活动，使研究为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回击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功
能。正因为如此，抗战史研究不仅在中国现代史甚至在整个史学研
究中成为日趋活跃的“显学”了。

但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应该说在理论上还
有些滞后。这不仅表现在有的著作满足于描述历史进程而缺乏规律
性的探讨和理论性创见，而且表现在个别著作在涉及抗日战争基
本理论问题时出现一些常识性的疏忽和错误。历史研究并不等于
同于哲学研究，但历史研究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就会失去史
学的应有光辉，难以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与理论有关的是抗战
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目前尚缺乏反映抗战基本状况的总体资
料集，有些专题亦无资料汇编出版，地区史料整理和搜集亦很不平
衡，个别著作不太重视史料质量，误用史料乃至伪造史料者所在多
有。一个抗战史研究者固然不一定必须是抗战史料专家，但不懂抗
战史料的搜集、考证、分析和利用，肯定难以写出好的抗战史著作。
在抗战史研究的取向上，大体还存在着研究领域狭窄、狭浅的缺
陷。长期以来抗战史研究着重军事、政治，忽略经济、外交、文化、社
会，近年有所改变并逐步拓宽加深。实际上，窄宽、浅深是相对的。
正面战场的研究由涉及甚少而著述颇丰，继而出现正面战场与敌
后战场的关系的研究显得薄弱，对外关系政治内容研究日多，继而
出现文化内容研究显得不够。至于对国外抗战史研究的信息了解
和成果评析做得仍嫌迟缓，以至一些有影响的海外著作我们长期
未能读到，自难准确地判断其价值和短长。另外，如何使我们的抗
战史著作具有可读性而又史实准确，如何利用先进科学方法储存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和探索史料等，也是开展抗战史研究所未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对抗战史研究状况的粗略估计，我觉得要使研究深入，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必须提高抗战史研究的理论水平。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对战争性质、战略、策略、敌我形势所作的论述和总结，永远是我们研究的珍贵财富，学习这类著述，对提高我们研究的理论水平，至关重要。其次，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史料工作。这不仅要求我们认真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史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有份量的著作，还要在编辑各种专题资料之外着重编纂一部大型综合性史料集，以便研究者利用。第三，认真做好抗日战争史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础。没有好的专题研究，一般难以写出通论研究的“精品”。专题研究尚不充分而又需通论著作时只能从已有专题研究水平出发。第四，加强对国外及台港的抗战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国外日、英、俄等文字的有关抗战史料为数不少。目下通晓外文者众，但兼习多种外语的研究者尚属寥寥，因此翻译和评介国外抗战史著述仍很必要。对于国外行之有效的诸如口述、数量、比较史学等研究方法应予采用，以提高抗战史研究质量。最后，发挥抗战史研究的“借鉴”、“育人”功能，更好地为发展爱国主义教育服务。抗战史研究者应该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具有科学性、革命性而又有可读性，逐步消除某些可读性强，但史实不准的“抗战读物”流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我相信，通过《抗日战争研究》的组织和推动，抗战史研究一定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扬成绩，克服不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点设想

唐培吉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中国近现代内容非常丰富多彩的历史，也是意义极为重要深远的历史，引起许多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兴趣和研究，亦发表出版了不少论著。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及其刊物《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办，终于把分散的研究个体聚集成一支质量多质高的学术队伍，它组织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讨论会，把90年代以来的科研成果集中到《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版，向海内外昭示，大大促进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发展。

从更高要求来看，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抗日战争各个方面的史料基础尚不够深厚扎实；第二，抗日战争全面系统的理性研究还有待于深化完善。因此，今后如何开展研究，从指导思路上说，可否将全面系统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理论的研究总结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具体设想能否抓住下列10个方面的研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 对日本内部的研究，可以说这是对抗战中敌我三方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着重研究三个层次的问题：(1) 日本侵华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的具体形成和发展历史过程；(2) 日本各阶级、阶层对日华战争的态度及其发展变化的情况；(3) 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日华战争中的发展变化的状况。

2. 日本在华的侵略罪行和暴行的调查研究。最好能够在日本侵占过的每个城镇乡村都有一本日本侵略史，真正做到“罄竹而书”，“铁证如山”，永远无法翻案。

3. 对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系统的研究，
既要对各个民族、阶级、阶层、团体及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态度和活动，进行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又要宏观考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及其历史经验；从而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团结、奋起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

4. 中国军民浴血抗战需要全面研究。正面战场的战役战斗应在史料基础上进行研究；敌后战场应将每一环节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的作战史进行调查研究，不管战斗的大小，都是对侵略者的斗争，均应一一写入。从现有出版的论著来看，有的地区如琼崖军民的抗日战争史反映很少。这项细致艰苦的研究工作如能完成，那种“游而不击”、“避而不战”等不实之词就不会有任何市场了。

5. 关于抗战中的经济，着重研究一个被敌人占领了大量国土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在经济上能坚持抗战的历史经验。

6. 研究抗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应进一步研究抗战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7. 全面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应改变过去那种德、意、日和英、美、法都是“铁板一块”，毫无区别的简单方法；并应研究中国在抗战中国际地位提高的过程和原因。

8. 研究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国共合作的正面效益和历史经验。

9. 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着重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10. 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以五大洲世界史的观点进行考察评价。

这样规模庞大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工程，只能由中国抗日战争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来组织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力量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开辟专栏征集文章开展探索与争鸣，把微观历史学和宏观历史学结合起来，全面运用，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发生质的飞跃，以辉煌的成果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法学院）
不要再说抗战胜利是“惨胜”了

张振鹤

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快到了，我国将举行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壮举，是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一个转折，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确实值得纪念。

恰在此时，读到一本以抗日战争胜利为题的著作，书名有点别致，叫做《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此书不是刚出版的。大约一年多以前就看到了它的出版及内容简介的报道，作者是马振犊同志，马上就想起 1993 年初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曾见过他并参加他的一篇文章的讨论的情况。那篇文章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如今他出版专著，怎么用了这么一个书名？以“惨胜”概括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哀伤悲叹这个胜利？还是挖苦奚落这个胜利？一时甚感迷惑。和一些同志议论，多觉得这个书名不大对头。后来陆续读了一些有关的书评，看到陈新同志明确表示“不欣赏这本书的书名”。（见《民国档案》1994 年第 3 期第 129 页）

最近读了这本书，感到问题不在于书名。这个书名乃是由书的内容来的，全书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述最后一小节标题就是“惨胜”。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两种胜利观：

对全国人民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 2000 余万中华儿女的鲜血和生命以及几百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来换取的，是一项空前而悲惨壮烈的胜利。

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其在饱尝了日本的
欺辱压迫之后，费尽心机竭尽其能，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鏖战周
旋八载之后取得的一次凄惨的胜利……不免带有几分勉强的凄惨色彩。
（第319—320页）

两种胜利观，一个“悲惨壮烈”，一个“凄惨”，二者统一于一个
“惨”字，是为“惨胜”。查《现代汉语词典》，“惨”字的释义就是“悲
惨”、“凄惨”，可见作者使用“惨胜”二字是准确地概括了“悲惨的胜
利”、“凄惨的胜利”的。又查《新华字典》“惨”字的释义，当其用于
“凄惨”、“悲惨”两个连词时，意思是“可悲惨，使人难受”。照此解
释，“惨胜”就是“可悲惨的胜利”，“使人难受的胜利”了。也许作者
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既然用了“惨胜”这个词，客观上就赋予了
这个含义。而把抗日战争的胜利论定为“可悲惨的胜利”、“使人难
受的胜利”，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未免太可悲惨、太使人难受了。

不过，“惨胜”这个词并不是本书作者的创造，他是从历史堆中
挖掘出来的。书中接着写道：

战后某些学者将我国抗战的胜利概括为“惨胜”二字，笔者认为其
评价之形象、适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既是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
抗战表现之总结，也为胜利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第320页）

由此可知“惨胜”之说早就有了，多年无人提及，在抗日战争胜
利50周年即将到来前不久，又因此书而得到宣扬。当年的“惨胜
论”，照李新同志所说，“是抗战胜利之初，一些人对蒋介石不满，用
这个词来挖苦他，挖苦他总是在那里吹嘘他对抗战取得胜利的功
劳”。现在这个“惨胜论”，看来主要还是对着国民政府说的（将论述
正面战场的书定名为《惨胜》，表明了这一点；但又有“对全中国人
民来说”云云，所以又不是完全对着国民政府），但对它的抗战有所
称赞也有所指摘，而没有挖苦，所以这个新“惨胜论”与旧“惨胜论”
用词相同而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不过，无论如何，用“惨”字来论断
抗日战争的胜利，总是不妥当的。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
战争。在抗战问题上，中华民族内部有各种分歧，有许多斗争，但以
夺取胜利为目标，为争取胜利而战斗，全民族是一致的。战争如果失败，全民族都要遭遇。战争终于胜利了，这是全民族的胜利。胜利对不同的人可能发生不同的影响，但胜利本身属于全体中华民族。这是全民族的光荣，使全民族扬眉吐气。这胜利是一个整体，为全民族所共有，不可以分割，既不能由这一部分人独占，也不能从那一部分人剥夺，尤其是对这些人“悲惨”，对另一些人“凄惨”。“惨胜论”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种贬损，不管是论者的主观意向如何，它贬损的不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胜利，而必定是贬损了全民族神圣抗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不久前在台北一次“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听到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学者大声疾呼：“不要再谈抗战胜利是‘惨胜’了！”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在抗战问题上不要再自我贬损了。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也应当是我们看待这场战争的基本立足点。研究这场战争应当记住这一点，评论有关这场战争的人和事也应当记住这一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纪念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 50 周年
及挽救此一光荣历史

[美] 吴 天 威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华盛顿史密生（Smithsonian）航天博物馆计划于今年 5 月作出以“最后一页：原子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题的展览。自去年 1 月展览说明书稿本传闻以来，即遭美国退伍军人团体及其他有关组织，包括华人团体的“全美华人向日皇抗议索赔委员会”及“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纷纷抗议。因展览的内容竟把日本描述成为战争的受害者，美国反倒成为侵略的嗜杀者及反原子弹的观点，美国参议院于去年 9 月 22 日通过议案，要求斯密生博物馆修正说明书稿，以符合史实。该馆召
开多次的讨论会并印其说明书稿,但仍未能使反对者满意,同时
反战团体及一批历史学者亦起来支持斯密生之原说明书中稿之观
点。及至今年 1 月下旬,拥有三百余万会员之“美国退伍军人协
会”提出取消整个展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窦鲁(Dole)建议国
会对斯密生展览问题听证,同时有 81 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斯密生
航天博物馆(直属于斯密生博物馆)馆长哈卫特(Harwit)辞职,展
览前途犹未可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亦即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结束,故美国
斯密生博物馆的展览直接关系到日中战争的历史。今年 1 月中旬
在台北召开了“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
的中外学者 79 人签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结束 50 周年的展
览发表我们公正的观点”之声明。其观点可归纳为:(一)14 年的日
本侵华战争(1931—1945)造成史无前例的“中国的火劫”,仅“南京
大屠杀”惨案即有其无辜同胞 34 万死难于日本人屠刀之下,远较
广岛及长崎原爆为甚;(二)日本虽知战败之不可免,仍企侥幸获胜,
准备于日本本土与美军作战到底,其所恃者为关东军可以据守
以通化为中心之东边道防线抵抗苏军,及“七三一”部队发动细菌
战,可阻苏军于北满及驱逐攻占日本本土之美军;(三)如无中日战
争开始于先,恐亦不至发生太平洋之战,后者之能继续,以至于最后
击败日本赢得最后胜利,中国之坚持抗战到底及协助美军反攻实
为盟国胜利之基础。

过去讨论中国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胜利,尝以研究不足,或碍
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未能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对抗日战争作出的
贡献,或由于自卑感的驱使,未敢宣称中国对盟国在太平洋战争的
胜利结束是不可缺少的。

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直到最近 10 年才在中国大陆逐渐展开,
并已获得显著的成绩。14 年的抗日战争历史包括的范围甚广,必
须从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多方面探讨。但是我千百万战士英勇的
浴血抗战和可歌可泣的慷慨就义,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的飞机大
炮，终于因数千万军民的牺牲换来最后的胜利。雪我民族百年之耻
尤应大书而特书。惜此民族之千秋伟业，因战时国共阋墙之争，继
之以全面内战，复受冷战期间之国际形势之影响，导致数十年对此
一研究之荒废。更要者，我年青一代对此一民族之大劫与苦难所知
殊鲜，忽略抗战胜利之来之不易，甚至丧失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
有伤国本。因此，我举国上下应把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作为教育
界当务之急。

再看今日之日本青年多不知中日战争之存在与日本之对华侵
略，更谈日军之在华暴行。此即为数十年来，日本朝野一致（只有少数
例外）掩盖侵华历史的结果。试观 1994 年一年之内竟有内阁阁
员 3 人（永野茂门、樱井新及桥本龙太郎）先后否认“南京大屠杀”
或否认对华侵略！为维护真实历史，尊重公理正义和发扬抗日战争
的民族精神，我们必须积极的献身于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恢复其
全貌，以免遭淹没之虞。

（作者单位：美国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

办好刊物教育中日两国青年

李良志

《抗日战争研究》是我最喜欢阅读的刊物，这不仅是因为它的
内容与我的教学、研究相一致，而且也因为它自身具有许多鲜明的
特征。比如该刊在编辑思想上很注意重点突出，每期就有关抗战
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刊登一《组
很有份量的论文，使读者对这些问题有较为系统、重点的了解，读
后印象深刻，感到收获很大。

其次，该刊的学术性强，敢于刊登探讨性的述评，引导争鸣，活
跃学术空气。比如该刊前后刊登了 3 篇有关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攘
外必先安内”的论文，我认为很能启发人们思考和研究问题。“攘外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必先安内”是古今中外任何统治阶级在面临民族危机时的根本治
国之道,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历史经验,它并非一律是大逆不道的反
动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要不要执行这一政策?当然是需要的,问
题是“安内”的对象是谁?以及如何“安内”。国民党执行这一政策
的反动性,不是政策本身,而是它当时“安内”的主要对象是错误
的,它把当时最坚决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工农红军
当成死敌,而且采取了“围剿”、“清剿”等残酷的暴力消灭办法,对
其他的政敌,是消灭异已,这是其反动性之所在。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越是要“安内”,其“内”越是不安。“安内”有镇压的内容,也
有调整关系的内容。对真正的敌人汉奸、卖国贼,应坚决消灭;对可
以合作的政治势力,应在顾全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调整各种关系。
国民党后来在抗日的前提下,调整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就出现
了共同御侮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国民党审时度势和
全国人民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放弃首先要推翻国民
党统治的苏维埃革命路线,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从这里
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基本出发点并不是
对日投降妥协,不是根本不抗日,而是先安内,后抗日。国民党割裂
抗日与安内的内在联系,不知把两者很恰当的结合起来,也是其错
误之一。贵刊就这些问题,引导争鸣,活跃了学术研究。此外,贵刊
还刊登了“何梅协定”、新生活运动等问题的论述,也收到了这样的
效果。

贵刊的另一优点和特征,是政治敏感性很强,常能思人之所
思,急人之所急,能及时反映抗战史宣传、研究中的敏感问题。比
如,有关日军侵华暴行、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的战后赔款、日本右
翼势力对侵略战争翻案……等等问题,本来是人们应能畅所欲言
的问题,但有时鉴于国际格局的变化,非任何人都能对此无所顾忌
地发表意见。但贵刊把学术问题同政治外交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尊
重历史,尊重事实,坚持真理,分清是非曲直,对应该批判揭露的问
题,就坚决地揭露、批判,发表了中外学者对有关问题的一组组评
述,为我们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欢迎、拥护;其中特别是及时驳斥了永野茂门、樱井新等人的翻案谬论,对教育中日两国的青年,促进中日两国友好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都是绝对需要的。

今年 8 月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对这个胜利,中国人民英勇奋战 14 年之久,付出了 2000 万余万人的鲜血生命和 1000 亿美元以上的巨大经济损失,代价实在太高,胜利实在来之不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昔日侵略者的刀光剑影,暴虐无忌,和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无不历历在目,永远不能忘怀。历史经验值得永远牢记,我们一定要隆重纪念这个伟大的、难以忘怀的日子,希望贵刊今年多发表有血有肉、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论文、资料,以教育和激励我们的后世子孙。对今天一些纸醉金迷、醉生梦死、道德堕落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付很好的清醒剂吗!对国外一些妄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人来说,也可以教训他们要三思而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建议增加“抗战文化”栏目

王 淇

中国在本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中期进行的抗日战争,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作为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学术季刊,办得颇有生气,受到许多学人的关注和重视。从已出版的 14 期来看,值得称道之处很多,我只谈印象较深的几点感受。

第一,深刻地阐明了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中国人民空前广泛的民族觉醒,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形成抵御外侮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
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
注重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严正批判日本
政界少数官员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指出正确对待历史是中
日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第三,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确认科
学的思想理论总是不断的由新事物、新认识得到充实和完善的,对
那些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给以尊重和发表的园地。第四,注
重专题研究和史料的发掘,同时密切跟踪学术研究动态的报道。以
上所说的优点和长处,希望今后继续发扬。

为了扩大读者面,我建议增加一个固定栏目:抗战文化,以大、
中学生及其教师为主要对象。抗战文化，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在
这个栏目里,把中国文化界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种种活
动,尤其是把那些激励人心、能够净化人们灵魂的优秀创作,逐一
展示出来;教育我们新的一代挺起胸膛,竖起脊梁,为中华民族的
振兴而拼搏,而献身!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我还
建议,将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上有长远的阅读价值的好文章,选
编成册出版,使它们广为传播,并借以弥补过去发行渠道不畅的缺
陷。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抗日战争研究》与抗战史研究高潮

胡德坤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伟大的正义
战争,其影响之大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改变了世界。正因为如
此,战后世界各国均竞相研究二次大战,早在 50 年代便进入高潮,
至今方兴未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抗战史和二次大战史的研究，直到80年代才进入高潮。《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正是适应我国抗战史研究高潮的出现而创刊的。

我是《抗日战争研究》的忠实读者。我以为，《抗日战争研究》在诸位编委、主编、执行主编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创刊三年多时间以来，成绩斐然，引人注目。其一，《抗日战争研究》站在我国抗战史研究的前沿，发表了一系列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代表了我国抗战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从《抗日战争研究》发表的文章作者来看，既有我国著名的抗日将领、抗日老战士，亦有饮誉海内外的抗战史研究专家和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可谓“文武荟萃，少壮咸集”。拥有这样庞大的作者群，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它成功的基础。从发表的论文内容来看，涉及到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重大事件和人物等各个领域。尤其可喜的是，专题研究明显加强，内容明显深化，领域明显拓宽，新史料也不断被发现。这些表明，《抗日战争研究》已成为全国性的学术论坛。1992年，我和南开大学俞辛焞教授在日本东京会见著名中日战争史专家秦郁彦教授时，他还随身带有一份《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可见，《抗日战争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其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包容了大量的学术信息，是抗战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学术刊物。《抗日战争研究》大量刊载了全国各学术刊物关于抗战史的论文目录，全国各出版机构出版的有关抗战史研究的学术专著和资料，全国性和地方性关于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综述，一个时期全国抗战史研究动态述评及专题研究述评，介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抗战史的新著作、新史料等等，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研究信息，为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三，《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转换的枢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里程碑。因此,研究抗日战争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一环。

其四，《抗日战争研究》还积极参加了国际斗争,如《驳永野茂门》(1994年2期)、《最近一波批判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的浪潮》(1994年3期)等文,对日本政府内某些大臣美化日本侵略战争,为侵略战争辩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谬论,进行了及时批驳,捍卫了历史的真实,捍卫了真理,是很可贵的。

当然，《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仅四年,还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如针对抗战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有计划地组织和刊载专题系列文章,加强对战时中外关系和围绕中日战争而展开的国际关系的研究等等,但从总体上看,成绩辉煌。

“花胜去年红”。《抗日战争研究》是抗战史研究工作者共同的学术园地,我们希望、也完全相信它会越办越好。值此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暨《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四周年到来之际,千里寄语,是为贺。

祝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系）